

戰略瞭望

## 展望中國崛起與兩個一百年目標

### How to Understand “China’s Rise” from the Two Centenaries?

王宏仁

成功大學政治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揭露了所謂的「兩個一百年」的宏觀目標。根據其定義，第一個一百年是要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第二個百年則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道路。時間分別預定在 2021 年與 2049 年完成。今年（2021 年）已經將要驗收第一個百年目標，而 2049 年則還需要一段漫長時間，不見得會在習近平的任內完成。不管如何，諸多的觀察家均揣測，習近平心中是否在這兩個時間點上還設下額外的、言外之意的目標，例如，兩岸統一大業、超越美國並主宰世界等等云云。大家之所以在猜測，主要原因包含了中國大陸政府的決策向來沒有西方民主國家透明，以至於只能從外面猜測可能的決策內容。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不相信中國在政策宣傳上面所說的內容，包含中國現代化的完成、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民主文明與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以及，兩個百年所提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目標為何的問題。更進一步而言，大家懷疑中國的動機無非是受到我們現在認識中國的方式所影響，包含對於中國崛起的評價。這

個認識方式在近幾年來特別受到現實主義的影響。

儘管國際關係的理論並非只有現實主義，還包括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但是，這些西方所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理論剛好在對於中國崛起的認識上有了共識，或甚至是共謀。例如，在一個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中，國家是被設定在自助（self-help）的安全困境中，因此會造成相互的陌生化（estrangement）。上述理論之間的差異性就在於怎樣打破這樣的陌生化問題：例如，加強軍事防衛、利益合作、或者社會化。在面對中國這樣模糊、不熟悉的對象之時，美國曾經希望透過協助中國國內社會基礎的現代化成功來進一步改造中國的執政黨或是整個國家（例如 Henry Paulson 在《與中國打交道》一書中所描述），但是這一切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其實是徹底令人失望的。就一些長期觀察中國的專家而言，問題還是出在領導人身上。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讓原本的制度改革似乎又回到黨或領導人權力集中的治理模式，這對於原本中國自鄧小平以來的各項改革發展—社會意見的日益多元化、尋求共識的領導決策以及公民社會的崛起—產生很大的阻礙（David Lampton，2020年2月改版，《中國夢：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現實主義對於指導吾人認識中國更像是教戰守策，而不是理論預測。這從川普和拜登兩位總統上台之後在面對中國所採取的共同態度上更加清楚。不論這兩位政黨意識形態差異頗大的美國總統如何在對中政策上產生一致觀點，都已經很明確地在各項政策白皮書中點名中國就和其他威權主義政體一樣，已經對美國造成威脅。不過，這裡面的確也參雜了自由主義的劇本，集，將一個國家的政體型態變成是決定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型態，這並不是現實主義者會去考量的。但是不管如何，筆者想在此強調的是，當美、中關係

在這裡被歸類為競爭或是敵人的結果，是受限於我們認識中國的方式，而這個方式往往宣稱有普世性，也因此讓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無形當中共謀在一起。這也就解釋了為何標榜人權、民主信仰的自由主義者也成了現實主義式的殺戮者。因為在主權至上的聯合國原則保護下，還是必須有例外主義的產生，以便藉由由外而內的「干涉主義」來矯正任何一個被侵犯的人權問題。目前我們看到的新疆問題、香港問題，以至於可能之後的台灣問題，就是主權至上主義的破口和後門，得以讓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有正當理由來對中國或是其他威權國家進行制裁。

同樣地，以 **Wendt** 為首的建構主義者提供了吾人在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共謀之外的另一種理解美中關係的方式。在 **Wendt** 著名的比喻中，提到了人類與外星人第一次見面的互動問題。在此預設的場景中，基本上人類不會去預設外星人會事先知道我們本來所認知的各種概念，包括人權問題、國家利益、安全困境等等。不過我們會透過我們第一個行為或是外星人的第一個行為來猜測，而且透過持續的互動來更進一步了解對方可能的下一個行為舉止，等到重複性的互動已經足夠了，才可能達到一個穩定的對於自己（**self**）和他者（**other**）之關係的定論。在這個外星人和人類接觸的故事中，互動（**interaction**）是最重要的機制，不論互動中的人類或外星人原本各自帶了什麼理念。如果將這個比喻放在美中關係上，理論上美中各自原本有何種認知理念，應會因美中不斷相互接觸的過程而有所改變，漸漸找到共通點，這就是相互主觀建構的過程。

只不過，根據建構主義的觀點，國際政治間的認同，似乎只能在朋友、對手、敵人三種類別中打轉，這無形當中也限制了美中在交往過程中可能建立起的關係類型。在這裡我們看到建構主義和自

由主義的共謀。因為，近年來我們看到美國和印太地區國家的合作，均是以「理念相通」(like-minded)的口號做為合作的理由。而國家和國家之間要能夠「理念相通」，無非是依賴對於某些特定價值的共同認知而來，但是這在美中關係上並沒有發生。

美中之間的外交關係一直是試圖「求同存異」的。但是時至今日，即便是政治敏感度相對低的全球氣候暖化的問題，美中之間仍有不同的認知和看法。問題就出在雙方對於如何經營彼此雙邊關係的看法不同。對於西方人而言，美中之間的關係經營應該是落實在多邊主義的前置關係，這也是 **Wendt** 在外星人故事比喻中所忽略的。**Wendt** 認為人類和外星人見面時候不會先入為主地將自己的文化預設用來期待對方，而是透過互動的過程來建立。但是，美國與中國，或是中國與美國的接觸，不是人類和外星人的接觸，也因此彼此之間一定會先依賴彼此原先的認知來與對方互動。

更大的問題是，美國或是西方人的認知往往是普世性的，這也就會造成美國對中國會有很強的預的期盼，而這個預設的期盼理論上應在中國自從改革開放進入到國際社會之後就能觀察到的，因為那段時間代表很長的社會化過程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08, Social States**)。此種關係的建構是透過多邊主義的實踐而完成。這也是為何在中國不斷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研究各種規章法條之後，卻還讓西方社會震驚的是，中國仍屢次堅持自己的原則或觀點，甚至破壞大家原有的共識，這必然包含對於國際海洋法的遵守(南海領土爭議)以及人權問題。如果說中國所認知的關係不是這種多邊主義實踐下的關係，那又是什麼呢？畢竟，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不斷在捍衛當前的多邊主義體系—包含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中國不斷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問題可能就是出在我們誤會了中國看待關係的方式。

首先，中國的對外關係應該比較類似於美國自二戰後在亞太地區所建立的軸幅體系，也就是，以中國為中心向外與多個國家行為者所建立起的多個雙邊關係。在這種多個雙邊關係中，是無法預設一個共識型的關係（*consensual relationship*），因為每個國家與中國的親疏都有不同，這都必須要仰賴個別的經營。這也就是為何中方很少對於交往國會預設什麼實踐上必須遵守的規則（例如在一中原則上的表態與儀式性實踐），因為本來就沒有統一的規則可以適用在所有交往國身上。其次，正因為中國預設了這種無條件限制的外交交往關係，自然也認為其他國家應該也用同等的方式與之對待，所以，不管中國式的民主、經濟體系、黨政關係如何地與西方國家所認知的現代民主國家的定義不同，都不應該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正常交往的前提或是障礙。事實上，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今年 3 月 19 日與美國的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會談時候所提出的論點，就是建立在此觀念上。也就是，國家和國家之間只要先管好自己國內的事務即可，不需要以這個為干涉對方的藉口。

當然，中方此話一出，馬上被認為是一種例外主義表現，因為中國似乎在不同場合，都會以中國現階段不適合西方所提出的標準來迴避他應該履行的國際義務或責任。但從中國的角度來說，美國早就在表現例外主義，而若是中國有其特殊需求必須例外於既有的規則，也只是證明了一套普世皆準的規則是有問題的。最後，中國在國際關係的建立上並非規則型導向的國家，而是角色型，這其實在很多挑戰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文獻中均有提到。所謂規則型的導向，是比較有明確的準則去實踐或遵守，而角色型導向的關係，則是有賴國家行為者彼此在一個特定秩序的認知中去理解作為某個特

定角色的責任為何。當然，這裡會有社會建構論的問題，也牽涉到中國自我一廂情願或是浪漫化某些角色的問題，畢竟，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體會中國所希望獲預期的角色責任應該是什麼。可見這裡又牽涉到在互動關係中，勢必還是需要最基礎的共識認知，以及有空間讓雙方行為者去摸索互動之後才建立的關係內涵。

回到最初對於了解中國大陸兩個一百年的問題，吾人必須反問我們是用怎樣的角度來認識這個主題，而也會因此得到不同的結論。如果要觀察中國政黨發展的變化，是不是有多黨制的預期？如果我們觀察中國與大國之間關係的變化，是不是就避免不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如果我們觀察中國大陸的軍力發展，是不是就無法擺脫軍備競爭的威脅？如果我們觀察中國大陸經濟援助的情況，是不是就自然而然認為新的殖民主義或是債務外交的陷阱正在進行中？如果我們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在將來兩個百年內的政體發展情況，是不是就只能以民主政體的改革方向作為目標來研究？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是不是我們在了解中國大陸的任何事務中已經過度採用某種特定的概念以及其背後的形而上論點（而沒有別的選擇），導致我們在研究的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我們設自己想出來的空中樓閣？